



# 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 石景山制铁所



首都钢铁总公司(简称首钢),曾经是中国建立后举世知名的十里钢城。但是,人们不能忘记这里还曾经是——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石景山制铁所。

**疯狂掠夺**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以后,日本侵略军司令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”隶属下的兴中公司接管了龙烟铁矿,将石景山炼铁厂易名为“石景山制铁所”。为掠夺钢铁资源,兴中公司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协力投资,1938年4月,开始修复龙烟铁矿所建的日产250吨炼铁炉。

紧接着石景山制铁所扩建,实行野蛮的圈地,以每亩好地作价中国准备银行币40元、瘠地30元的低廉价格征地25000亩;强拆4个自然村民房3000余间。日本侵略者抢走农民的耕畜和财产,用刺刀逼着倾家荡产的农民进入石景山制铁所;更有甚者,日本侵略军用绳索、铁丝把在卢沟桥等地英勇抗战的900余名被俘人员押进石景山制铁所,不论伤势轻重都要服苦役;此外还从河北、山东招募数以万计的“募集工”。

1938年11月20日,石景山制铁所修复了贮水池和水塔泵站与铁路等设施,修复后的日产250吨的炼铁高炉点火投产。

1940年末,兴中公司解散,资产转给“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”,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各增资1250万日元,按照日本军部的指令,扩大钢铁生产。石景山制铁所易名“石景山制铁矿业所”。1941年3月,由日本八幡制铁所拆迁日产360吨废热式焦炉及洗煤设备,并于翌年3月投产。1941年12月8日,由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和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共同出资2亿日元,成立“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”,改组石景山制铁矿业所为石景山制铁所。石景山制铁所扩建至设计年产50万吨铁,以适应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。

1943年夏,石景山制铁所第二次征地10000亩,每亩水田仅作价230元,当时玉米面每斤2.6元,只能买玉米面88斤;一间砖瓦房仅作价200元,当时每块砖价0.8元,只能买砖250块。据伪宛平县署与石景山制铁所互换的第10号函件所述:“查此次占地,民众生活无依,农民绝望,纷纷破产。”石景山山下村有51户人家,乞讨度日者就有6户。

同年,由天津、上海迁建的11座日产20吨的特型炉和由日本釜山制铁所迁建已停用10年的设计日产380吨炼铁高炉于年末投产。1944年1月,自上海市南市发电厂迁建的3200千瓦和6400千瓦发电设备投产送电。2月,由日本大谷制铁所拆迁日产600吨炼铁高炉和650吨蓄热式焦炉投产。

1945年8月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日本侵略者在侵华的8年中,投入日本人2961人,其中石景山制铁所1357人、龙烟铁矿1139人;奴役华工约6万人。掠夺龙烟铁矿砂374万吨,生铁270952吨,其中石景山制铁所为250257吨、龙烟铁矿为20695吨。

**残酷压榨** 石景山制铁所当局实行军事管制,为便于对华工的驱使和奴役,所长、部长、系长、课长、科长、车间主任、工长乃至工员均由日本人担任。日本制铁所设立由日本人管理的“包工柜”,当时有“丰川组”、“义和祥”、“义诚组”、“大林组”、“飞岛组”、“干高组”等“包工柜”30多个。“包工柜”的把头叫“大柜”,下设很多“二柜”,“二柜”下又有许多小把头。他们把华工称作“苦力”,收缴“苦力”的“良民证”,华工们失去了人身自由。华工们吃的是“混合面”,干的是牛马活,不知有多少人饿死、累死。

日本侵略军残酷地榨取华工的血汗,里工日班为10小时,运行工为12小时,外包工则是干12小时,一加班就是24小时甚至36

小时,才能休息12小时。华工的工资低得可怜,一般临时工每天的工资只能买上一斤玉米面。华工们自顾不暇,根本无力赡养老人和妻女。

1938年,河北、山东等地连年受灾,日本包工头和当地地主、恶霸相互勾结、欺骗受灾农民说到关外干活,管吃管住,还另发工钱……许多农民受骗上了拉“苦力”的闷罐子车。这些“募集工”住在石景山制铁所用苇席搭成的窝棚里,大伙挤着轮班睡地铺;上白班的走了,下夜班的睡。冬天,窝棚四面透风;夏天,蚊蝇成群。“募集工”的身上虱子成串、疥疮成片。上白班的“募集工”半夜3点被工头叫起来,在日本兵的刺刀和工头的棍棒、皮鞭下连续干活,一直到晚上9点才收工。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两个混合面窝头和一点盐水煮黑豆,一个工钱也不给。“募集工”们个个骨瘦如柴,身上的衣服早就穿烂了,只好把水泥纸袋剩下四角、中间掏个洞套在身上。没有鞋穿,就在脚上裹些野草、麻袋片。“募集工”在日夜煎熬着,当时,石景山制铁所流传一首民谣,是“募集工”和“苦力”的真实写照:

火车一冒烟,来到石景山。  
进了制铁所,入了鬼门关。  
来到石景山,入了花子班。  
披着麻袋片,睡铺露着天。  
一进义和祥,如同见阎王。  
虱子连成串,吃的混合粮。  
如同见阎王,病魔又猖狂。  
摧班鞭儿打,蹬腿小命亡。

华工们没有劳动保护措施,就是炼铁炉前工也只发一双木板拖鞋;石景山制铁所工伤事故层出不穷。1939年永定河汛期期间,土木系日本人板本要把河水引进石景山制铁所,逼迫不会水的华工下河截水,水流湍急,7人溺水淹死。1942年7月,第一炼铁炉发生结瘤事故,制铁系日本工头强迫华工冒着摄氏90度的高温,钻入炉内扒料。炉料坍塌,当场烫死5人,重伤18人。第一炼铁炉炉顶料钟(炉盖)经常发生卡料事故,华工李树德爬到炉顶撬料,不幸被溢出的煤气熏死。另外,在料仓卸料的华工,由于超强度劳动、精神恍惚,跌入料仓、料罐而卷入炉内被活活烧死者屡见不鲜。制铁所在建第三高炉时,高空作业的脚手架用稻草绳捆扎,因稻草绳强度不够,造成脚手架倒塌,华工摔死7人,伤19人。据昭和十九年(1944年)3月《北支那制铁作业月报》载,全月发生大小工伤事故31812起,日平均工伤事故达1026起。

1943年夏初,北京《新民日报》刊登石景山制铁所招收童工的广告,从北京、天津、济南等地招收13、14岁的穷孩子2000余人,日本侵略者称这些孩子为“养成工”。在古城村东(今古城中学)建有几排土坯房,就是当年的“养成所”。当时,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实施“强化治安”,为了推行奴化教育,“养成工”每人发一顶日本帽,先学习3个月日语和日本体操。日本侵略者不仅采取罚站、罚跪、打嘴巴等刑罚折磨“养成工”,还在饭前强迫“养成工”朝着混合面窝头和臭咸菜鞠躬,用日语高喊:“这饭真好吃!”饭后再向空饭碗鞠躬,再用日语大声喊:“谢谢天皇!”日本侵略者还经常让“养成工”集体朝东下跪,向“天皇”和“大日本皇军”“忏悔”。

“养成工”难以忍受折磨,有的被打死,有的病死,还有的逃跑了。至9月受训结束时,只剩下100多人。这些“养成工”被分到制铁所各车间当“仆役”,专门为日本人提水、倒茶、点烟,继续受苦受折磨。

1943年9月,石景山制铁所发生“虎疫”

(霍乱)传染病。9月16日,北京《新民日报》载文:“虎疫危险地区,京市与石景山遮断交通5日……”“京警察局以石景山发生虎疫,援助西郊分局,对界内各站口实施严格检查,对该区来人,一律拒绝入市。”日本侵略者为掠夺钢铁资源,实行惨无人道的隔离。石景山制铁所防疫队在军、警、宪兵的配合下,在石景山制铁所工地和附近村落野蛮搜查,把病患者和饿殍强行装上防疫车,扔进北辛安南侧金沟河故道几个挖取砂石的大坑内,再撒上白灰,拉上铁丝网,形成数个“万人坑”。

据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载:“对从事建筑业十大社(即10大‘包工柜’)调查。9月11日,义和祥和44人因病隔离;有258人逃亡(失踪)。”“在砂石场的180名中国工人中,仅在4天内就隔离了136人,其余44人全部失踪。”“‘虎疫’发生前,使用中国工人(指外包工)12370人。发生后,中国工人减少到11280人,逃亡者为1090人。”“从作业所及建筑包工柜所管辖的工人看,所减少的人数至少有5600人之多。”

“虎疫”灾害在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“防治”下,石景山地区出现了若干个“万人坑”,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灾难。据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载:“自从虎疫发生以来,真性患者是8人(其中日本人2人,华人4人),带菌者34人;怀疑患者17人(其中死亡华人1人),合计58人。”由此可见,扔进“万人坑”的累累尸骨都是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、草菅人命的结果!

**英勇斗争** 日本侵略军侵占龙烟铁矿和石景山炼铁厂后,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从未低头屈服,华工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,使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、不寒而栗。

1938年秋天,中共党员白振东和王长林奉上级指示先后来到石景山开展地下斗争。王长林是天津码头工人,来到石景山制铁所后,在“义和祥”包工柜当了个小把头,他和华工们同吃同住,亲如兄弟,谁缺粮少钱,他就拿出粮食和工钱周济。其他工头都说他傻,叫他“王傻子”;华工们却把他当做亲人,王长林成了华工们的主心骨。

白振东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宝坻县,因家境贫寒,1921年,他只身到天津裕元纺纱厂学徒。在地下党领导下,白振东组织裕元纺纱厂的工人率先成立了裕元纺纱厂工会,并当选为工会主席。1924年5月,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5月,彭真同志调任天津市委书记,从那时起,白振东就在彭真领导下工作,先后担任裕元纺纱厂支部书记和天津市第八区区委委员。1926年、1929年和1933年,白振东曾先后遭遇敌人三次追捕,他勇敢机智,多次化险为夷。白振东在石景山制铁所以“飞岛组”包工柜小把头的身份作掩护,他和王长林深入华工中开展工作。白振东和王长林利用到平西抗日根据地送物资、汇报工作的机会,带回宣传小册子和传单,在华工中秘密散发。他们联系了

华工30多名,用磨洋工、出废品等方式与日本鬼子“软磨硬泡”,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。白振东和王长林把在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,还把一些党员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。

1938年6月,在卢沟桥英勇抗敌被俘士兵中的一个班,策划用手榴弹炸死看管他们的日本侵略者。虽然未遂而英勇捐躯,却深深地震慑了日本侵略者。

1941年12月,石景山制铁所当局在第一高炉顶部放气烟囱上捆绑杉篙悬挂“膏药旗”(日本太阳旗),集会庆祝日本侵略军攻陷长沙、郑州和制铁所一高炉大修竣工。何文、李树德等华工,机智地开启炉顶大小料钟(炉盖),放出炉火,顿时将“膏药旗”烧毁。接着日本人再插“膏药旗”,何文他们再放出炉火烧掉。最后,日本侵略者不得已把“膏药旗”插在了炉腰,成为广大华工的开心笑料。

1942年秋天,北京物价飞涨,“干高组”头目本川不顾华工死活,把每天的工钱落了3角,饭钱再涨3角;消息传来,华工们非常愤怒,在王长林的带领下,土建工地所有华工罢工了。本川急了眼,马上派人把王长林抓了起来。华工们得知后,把本川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,高喊着:“把王长林放出来!”“不许扣工钱!”本川被迫答应华工们的要求,华工罢工取得了胜利。

1943年12月,第二炼铁炉卷扬室起了火。新建成第4号小高炉的冷却水箱被华工关闭,差一点烧穿了炉壁。1944年一天夜里,一个叫加成的日本鬼子上厕所,被电力系的一名华工用铁锹劈死。

1944年7月13日,日本驻华使馆向石景山制铁所发出指令:“自7月21日到月末作为特别‘生产加强旬’”。期间,日产生铁平均要达到380吨。”当时,石景山制铁所的生产很不景气。第一高炉设计能力为250吨,实际只有85吨;第二高炉设计能力为380吨,实际只有61.5吨。

在“生产加强旬”,制铁所当局安插宪兵、警备队员和工头威逼华工超强度地干活,中共党员卢焕章与广大华工在对敌斗争中摸索出了“泡”、“毁”、“走”3字诀。“泡”:就是有监工看着就干,监工一转眼就歇;白天不好“泡”就夜班“泡”。“毁”:就是上料时拣100多斤的大块矿石往料罐里装,以延长冶炼时间;或是光上焦炭,怎么炼也炼不出铁来。另外,火车司机与旗钩工密切配合,制造火车脱轨翻车重大事故。“走”:就是华工设法逃走,或是转到别的“包工柜”干活。华工们靠“泡”、“毁”、“走”破坏了制铁所当局“生产加强旬”计划,生铁平均日产210.2吨,仅为指令的55%。以后,制铁所当局又组织了数十次“生产加强旬”,均一句不如一句,毫无起色。华工们的斗争破坏了日本侵略者的出铁计划,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。

官庆培